

● 罗义俊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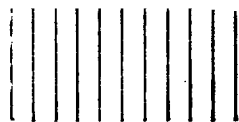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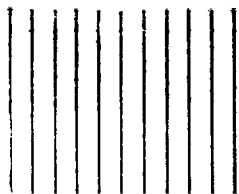
● 上海书店



理性与生命

· 1 ·

——当代新儒学文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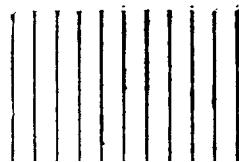


罗义俊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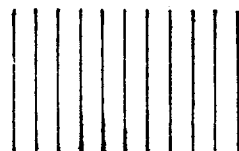
理性与生命

——当代新儒学文萃

• 1 •



上海书店



责任编辑：吕素勤

封面设计：范一辛

理性与生命

——当代新儒学文粹(一)

罗义俊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无锡古籍排版厂排版

宜兴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5 字数486千字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 7-80569-770-1/B·52

定价： 18.00元

沪新登字 119 号

弁 言

一 本编编序遵循黄梨洲、全谢山《宋元学案》编例义理。

二 当代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概念。新儒家是一人格一生命的概念。新儒学则是一学术的概念，唯自来儒学皆以人为本位，故生命仍为此学术的概念之内在本质义。新儒家是体，新儒学是其用，新儒家的儒学诠释与其内圣外王之作必是新儒学。唯其是一学术的概念，则自亦含一儒学研究的意义。但儒学研究，人皆可为，故儒学研究未必是新儒学，儒学研究家未必是儒家新儒家。

三 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是当代新儒学的主体，故本编所选以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著述为主。

四 本编所选的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为其第一代学者。其中，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勱、熊十力先生被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尊奉为当代中国的四大儒者，此于理必选。《中国文化宣言》乃当代新儒学的历史性文献，有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先生签署，而张先生乃倡议者，故编入本编张先生部分。

五 钱穆先生为史学领域中异军突起的新儒家第一代人物，与梁先生、熊先生为讲友，又与当代新儒家的三大支柱第二代人物唐君毅先生共同创办新亚书院，而与徐复观先生创办的《民主评论》、牟宗三先生主持的人文友会联成一体，展开了港台海外的新儒学运动，徐复观亦曾言他们以钱先生为师长辈。选编钱先生的

著述,亦可见当代新儒学的多彩多姿,学术广大。

六 谢幼伟为英国名哲怀黑德 (A. N. Whitehead, 1861—1947, 罗素之师)入室弟子,以西方哲学名家。但对中国文化与儒学的阐释与当代新儒家为同调,与熊先生、钱先生为讲友,又曾参与港台新儒学运动,新儒家第三代中健者、牟门高弟王邦雄先生亦是其弟子,海外亦有学者将他列入当代新儒家范围。谢先生的新儒学特重孝的义理之论发,此与马一浮先生以《孝经》为法门总持,声气相通。选编其文,当可有助于增进对当代新儒学运动一面的了解。但限于编者收集资料的匮乏,本书无法提供谢先生的生卒年及其著作出版的详细情况。

七 本编尊重出版单位意见,亦选编贺麟、冯友兰二氏早期论文。凡新儒家必对中国文化和儒学抱一宗教感情一超越信仰,此感情此信仰乃不可易者,此之谓归宗儒家。若无此或易此感情与信仰,则新儒家即失其存在性,纵然研究儒学有成就亦不到新儒家的位格。依此,将已经放弃了儒学立场四十多年或数易“信仰”而转而信仰马列的贺冯二氏定位为新儒家,则无论从儒学还是从马列角度视之,均显然不当。但他们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曾有儒学的知识表现与成就,这些表现与成就客观上亦曾发生过影响,此亦是海内外某些学者称之为新儒家的根据。鉴于上述理据与情况,在以“当代新儒学”而非“当代新儒家”更非他学为题的本编中,选编二氏四十年代有关论文而附于编末。

八 鉴于已经出版的《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政治性字句概未删略的成例,本编对所选编者亦以尊重原著、存真为原则,一仍其旧。

九 本编所选编的马一浮先生的著述原无标点,现均予以标点。熊十力先生的著述原乃断句式标点,现重新予以新式标点。因一时均找不到其他本子,故未能校勘;标点过程中,亦只能从文句

上订正其明显脱误处。唯此类脱误极个别，故径行改正，不再用符号标出。对马先生所引古文，多查阅原典校过，脱误处同前处理。其余各家选自旧平装、台版者，除均加标书名号及引文引号外，余亦同前处理。

十 凡选编各家均附一著作目录。

编者

目 录

弁言	(1)
近十余年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与所谓门户问题	罗义俊 (1)

梁漱溟

如何是东方化? 如何是西方化?	(30)
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较	(70)
理性——人类的特征	(73)
乡村建设的意义	(88)
乡村建设认识问题	(92)

马 浮

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	(112)
论六艺统摄于一心	(117)
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	(119)
理气 形而上之意义	(122)
知能	(125)
说视听言动	(128)
涵养致知与止观	(131)
复性书院学规	(135)
孝经大义序说	(149)
释至德要道	(151)
洪范约义·五行	(158)

张君勱

人生观·····	(167)
明日之中国文化·····	(174)
立国之道·绪论·····	(181)
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方案·····	(186)
我人思想之哲学背景·····	(200)
国家为什么要宪法·····	(216)
新儒家政治哲学·····	(225)
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	(240)
儒家思想复活之基础·····	(256)
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267)

熊十力

明宗·····	(317)
明心·····	(325)
明变·····	(348)
佛法·····	(367)
成物·····	(370)
读经示要·自序·····	(376)

钱穆

国史大纲·引论·····	(382)
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409)
中国文化与科学·····	(423)
中国文化特质·····	(432)
中国思想史·自序·····	(460)
如何探究人生真理·····	(467)
整体与部分·····	(477)
总体与部分续篇·····	(486)

谢幼伟

孝与中国社会..... (502)

孝治与民主..... (522)

论道德的自觉..... (532)

论价值意识的培养..... (539)

贺 麟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546)

五伦观念的新检讨..... (559)

文化的体与用..... (571)

近代唯心论简释..... (582)

冯友兰

新理学·序论..... (591)

理 太 极..... (591)

境界..... (614)

新统..... (628)

近十余年当代新儒学的研究 与所谓门户问题

罗义俊

一

当代新儒家困屯履渐，慧命相续，发展至今，已人历三代，时有七十多年了。由于其壁立千仞的人格，由于其崇高而内在的学术与文化价值之无法忽视的客观性，而日益受人注目。从现象上看，注目的一个方式与结果，乃把当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此所谓把当代新儒家作为对象来研究，主要是指在具有明确的“新儒家”或“(当代)儒家”的认识下，对其作带有整体性或专题性的研究，或对其前二代人物的个案研究。从事实层面上看，这个研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反映了当代新儒家的影响之范围的扩大与透显了其客观地位的不可否认性，由此亦可折射出新儒家的发展。

把新儒家作为对象来研究，其事滥觞于六十年代。1963年1月1日香港《人生》第292期刊了二篇文章，一篇是李震的《五十年来中国思想之大势》，一篇是顾翊群的《论儒家思想之复兴》，均推介了当代新儒学。李文经过对当代各家思想的比较概论，判称“为熊十力、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人所倡的新儒家哲学”，是真正尊重、发扬中国传统思想精神而又面对西方思想作客观抉择的中国现代思想主流之一。顾文为其上年冬在华府中美文化委员会聚餐晚会上的讲演词。当代新儒家，大陆学者多称之为“现代新儒家”，而此名称之刊于报端最早似即见之于顾文，其文谓“对现代新

儒家之哲理有兴趣者，应读以下诸学者之著作：张君勱、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谢幼伟以及其它学者。”不过，两文重在介绍，于新儒家思想观念或论焉不详，或付阙如，对后来的新儒学思想研究影响甚微。

至于那时的大陆学界，则正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左风蒸蒸日上的年代，“新儒家”其名连共和国的国门都进不了，当然谈不上什么研究。而五十年代“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以及某大学名教授著文批判钱穆先生的史学和《文化学大义》，纯粹是政治性的，且并不视他们为当代新儒家人物，即批判者事实上并无对“新儒家”的知识。除了留下批判者的千姿百态外，就“新儒学研究”而言，毫无研究价值。

对新儒学研究的真正开展，乃是近十余年来事。唐君毅先生的逝世无疑催助了近十余年新儒学研究的开展。儒学不论新老，均以人为本位。唐先生的道德文章一致的庄严人格为儒学在现代的生命之真实见证，其口碑在大陆内外。唐先生公祭日，与祭者逾千人。而港台两地悼文近百篇，其文有亦悼念亦带研究性的。学者受此哀荣，迄今绝无仅有，这无疑不仅是对唐先生且正包含着对新儒家的文化价值与其客观地位的肯认或同情性的认识。而新儒家的影响力亦进一步由内在潜隐而显发，这也是“悼唐”现象的内涵。事实上，在哀乐声中，“这该是表彰‘新儒家’的时候了”的呼吁，正是“悼唐”主题外的主题。悼唐风波创造了一种关注及研究新儒家的发散性气氛，尽管这气氛满溢着悲剧意味。而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国门移开，“新儒家”之名及其著作，包括悼唐实录《唐君毅先生纪念集》，在“发散”到异邦的同时也“发散”入境，为地因此而始渐有新儒学研究这件事。我个人虽由读钱先生的书而知唐、牟、徐先生，但受此纪念集之感染实深。

唐先生去世半年之后，牟先生七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牟宗三先

生的哲学与著作》出版，张灏以当代新儒家为专门对象的总体性研究的英文著作《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发表。次年，美国学者艾恺的新儒家人物个案研究成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印行。1982年10月台北中国论坛社召集港台及旅美的当今学者举行“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的专题座谈会。嗣后，对新儒家的研究在海内外渐渐展开。而经十余年的发展，如今已经形成一个颇为可观的势头，使新儒家几乎成了一个“讨论显学”和“学院显学”。

所谓“讨论显学”与“学院显学”，纯是从外在的事象上去说，从新儒家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研究对象上去说。譬如海外美、日、韩、新、欧洲都有学者研究新儒家，德国慕尼黑大学波昂大学还先后在七十、八十年代开设“张君勱思想”与“牟宗三哲学”课程。特别在美国，当代新儒学的研究，受到相当的重视，为一热门题目(1)。甚至研究生博士论文，若不消化熊十力、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的大作，就不能获得通过(2)。至于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当代新儒家亦是一热门话题，如1982年夏威夷国际朱子会议曾集中讨论牟宗三哲学，1983年国际中国哲学会多伦多会议曾热烈讨论唐君毅与牟宗三思想。近十年来国际学术会议凡论及中国哲学思想的，几无不征引牟先生的著作。

港台为具有运动意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生发展地（这不是用一句“大陆是儒家的故乡”可以轻易消解的）。除钱穆先生的弟子多工作于史学范围外，多集中于港台两地的方、唐、牟、徐先生的弟子，自觉遵循着新儒家上代宗师的工作方向。姑不论他们的研究所内具的弘道意义，从外表观之，攻读学位，民间讲学，举办会议，都有以新儒家为题目的，可谓人才鼎盛，多姿多彩，方兴未艾。其中影响发散出港台两地尤及于内地者，如1988年12月唐门弟子为主体的香港法住学会主办的“唐君毅思想国际研讨会”，与会学人百余，来自港、台、澳及新、日、美、加拿大和中國大陸，称一时之盛。

1990年12月,与牟先生关系很大很深的台北东方人文基金会、鹅湖月刊社主办的第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座无虚席,气氛相当热烈,当然亦是一种“显”相。

至于大陆,现象上也许更有“显”相。大学、社科院研究生课程,做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专题讲座,各类有关哲学与文化学术会议,当代新儒学都是时兴的题目。1986年,“现代新儒家思想研究”被确定为全国哲学社科七五重点规划科研项目,组织了数十人大型课题组。今年又继续列入重点规划项目。1987年9月在安徽宣州举办了大陆首次“现代新儒家思潮学术研讨会”。此后,渐次展开了对新儒家整体的与从梁漱溟、马一浮,直到课题组所划定的其第三代人物余英时、刘述先、杜维明的个案研究,还曾多次举行以新儒家为专题的学术会议。有关新儒学的内容成了学人讨论的一热点。92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山东济南,由山东大学哲学系主办,牟先生家乡栖霞一家陶瓷厂捐了部分款,对牟先生的生命与学问均有慧解真悟的颜炳罡具体筹划,举行了“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家学术研讨会”。会一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就争,一直争到结束,其热烈之程度,尤为近年所见之最。这预示新儒家将日益受到更多的学者的重视。据方克立教授在会上说,大陆自86年以来刊出的有关新儒学的论文就达400篇,而且今后几年内还要结合马一浮、唐君毅、钱穆等先生的诞辰纪念举行学术研讨会。其“显”可见矣。

两岸的出版界更是推波助澜。台湾印行了《方东美全集》,据悉还在筹划钱穆全集、牟宗三全集。香港出版了《唐君毅全集》。大陆《梁漱溟全集》、《熊十力全集》相继付梓问世,各出版社不顾出版淡季不怕重复,还将陆续推出《现代新儒家学案》丛书、《现代新儒学论著辑要》丛书、新儒家八大集、新儒学文粹,客观上都在为当代新儒学造“显”。

就事实上说,一个毫无内外政治集团势力背景与依傍的平民

学派与文化思潮，竟为各方如此持久不息地研究，这在当代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平心视之，这显然是由于新儒学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其自身与中国历史文化生命一体的内在价值之透显。而在当代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孔非儒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这个几乎是“学院显学”、“讨论显学”的出现，也说明任何人，即使他在反儒反传统，在其生命根处，都无法斩断自己的文化之根之本，故而无论自觉不自觉、意识或不意识、透出或不透出，都将会日益感到儒学新儒学的价值。甚至可以说，当你在想着法儿批判或反对新儒学时，你实际已经感受到了其价值。所以儒学新儒学之能否“显”，根本上乃其自身之价值事，并非是谁造不造的问题。本文之所谓造显，乃是相对于近十余年前受毁受批受挤兑冷落而言，而且此研究的“显”、讨论的“显”亦只是一与改变“儒门淡薄”关系不大的现象意义，并非是为作为当下社会文化生命与个体生命的指导原则的显。所以，近十余年的新儒学研究所呈现的，只能说是一现象性的发展。这个发展的现象性，估计近期不会有根本性转变。

二

值得注意的倒是，近十余年的海内外的新儒学研究现象，哲学地看是多元的展开，事象地说情况原来就十分复杂，可谓众说纷呈，有针锋相对，也有交光互影。从其研究态度来看，有否定的、批判的，也有认同、半认同的，以及肯师“叛教”反戈一击的。从其理解方式来看，有外观的，也有内观的。从其所持的立场与观点来看，则有马列的，有欧陆哲学或英美哲学的，有中国传统哲学的，也有宗教如天主教的。这样区分实际上已带有方便性，*因为实际情况还要复杂；有的界别并非很清楚，有的立场与观点并不一致，其立场只是一挂空无观点的“坚持”，如有的乃是马列套语西化心态或河殇心态。这可能是近十余年新儒学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时代性。

特点。在众说纷呈、多元展开中，如果略其小异，取其大同、视其“坚持”而又较有影响并成气候者，大体上，有三大派系。此所谓较有影响者，则不离笔者的地域文化立场，即指其对大陆之较有影响而言。

其一是西方与西方自由派。近十余年来很难找到一个足以代表西方或西方自由派的学者；大约在旅美学者中有些当代新儒学的批评者，在台北有原台大哲学系和中国论坛社系的学者，按他们实际的哲学立场和批评新儒家所持的观点来看，可以划入。至于大陆，纵然有所谓西方或西方自由派，亦是名实混淆，故不足论焉。

其二是中国大陆的马列派。此所谓马列，不是马库色批判理论到哈贝玛斯的新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现代东方或列宁毛泽东传统的马列主义。在大陆，从事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学人不少，故研究新儒家的为数亦不少，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境外学者所眺望式理解的那么简单，而是既有持激进观点整体否定新儒家的，有肯定新儒家的内圣学而否定其外王学的，也有态度平和、坚持立场而又表示要力实事求是的，甚至还有渗杂着他们所理解的西方自由主义观点的。其中，以态度大体平和而立场又十分坚持的一支为大系（从人数上说），可以代表研究新儒家的马列系，天津南开大学的方克立教授可为之代表。

方克立教授是博士生导师，他带着一批由他授业的专攻以新儒学为专业学位的新进，在大陆十分活跃；更主要的是同时还主持着“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大课题组，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研究。在大陆，这一支中的重要成员，对新儒学，常能以马列立场给予严厉的批评。

第三大系，即海外港台的新儒家第三代系，简称曰新儒学系，其中以台北鹅湖系为中坚。新儒家的第三代，亦不是如大陆学者所想象的那么单纯，只能比较地说大体上仍保持着前二代巨子所

持的历史文化意识极强烈的儒学与哲学立场。而从师承学脉上看，有出于张门、钱门的，也有出于方门、唐门、牟门、徐门的。这种学出多门，加上老二代新儒家巨子之间原就有学术重心与观点歧异，代与代之间所具体感受的存在世界亦有了不同，因此使得新儒家第三代的情况也显现着某种复杂性。此复杂性亦是一时代性特点。

有关新儒学系的此种复杂性，再看得细一些，则有的传承学脉，较单纯，如台北的张君勱学会（与其平行的为张君勱先生奖学金基金会）。但有的虽同出一门，认识观点亦未必一致。以最大的鹅湖系为例，虽然可能以牟门弟子为主体（就人数而言），但据我看已不能以理解牟先生早期所主持的人文友会的方式去理解；又据牟门弟子林安梧兄相告，谓情况亦已不那么简单。唐门、牟门弟子互通，联为一体，故以唐门弟子为主体的香港法住（佛教法住学会），亦当属于新儒学系。唯法住系另有自己的亦儒亦佛的学术性格。而此一性格，也表现新儒学系的多元性、开放性与复杂性。

新儒家第三代比起他们的前辈师长来，也许与西方哲学文化有更大的接触，有的长期或曾多年在西方社会生活，还有各自的西学导师，这也可能是造成其观点的多样性之一缘由；且因此其诠释语言更能年青一代所理解，而给人造成更具现代面貌的印象。事实上，年青一代的国文修养远不及上代，对他们来说，新儒家第三代的书更容易读。这或许也是时使之使然。

尽管新儒家第三代中已有不少取得较大的学术成就，甚至在其哲学与文化观念的诠释上亦自有形成特色的贡献，但我不认为他们已经超过了各自的老师及前辈各巨子。（即使其余派系的成名人物，其思想与知识成就亦远未达到新儒家前二代巨子的水准。）事实上，就总体而言，他们追随自己老师的精神与工作方向，对新儒家前二代巨子的研究，特别是授业老师的学问，仍以传承、弘扬为主，是继承性、弘扬性与诠释性三者统一的研究。这使他们仍未逸

出新儒学系范围。如果你认定新儒学是中国文化生命的当代延续与开展,自亦不必逸出。

此外,在台亦具影响力的,还有天主教系,如前辅仁大学校长罗光大主教,其所著《中国哲学史民国篇》对新儒家人物熊十力、方东美先生有专论,此外对唐先生、牟先生的思想亦有所研究。还有《中华杂志》发行人胡秋原先生,他原为熊先生的门人,与徐复观先生亦有较深的关系,所著《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虽初版于1973年,但5版于1983年,且《中华杂志》于八十年代仍刊过多篇有关张君勱、徐复观先生的研究或纪念文章。其书把中国近现代思想分为西化派、俄化派与传统主义或中国文化派,而以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先生为中国文化派,其涉及之言辞,肯定,赞扬,热情,一看即知。又有淡江(大学)系,代表龚鹏程教授,对当代新儒学有其卓见慧识,常有善意的批评,抓住问题。大体而言,天主教系自有天主教的立场与使儒家思想(天主教)教义化的宗教方向。若按《宋元学案》的编例,则天主教系只能附列于西方派,《中华杂志》系则是新儒家(主要是徐复观)的讲友与同调,淡江系是新儒家第三代的讲友、鹅湖系的同调。此亦可谓是一宽泛、方便的区分法。不过站在地域文化的立场与背景上来说,他们对大陆的影响显远不及新儒学(第三代)系。

经此概览,已不难发现,鼎足而分的当代新儒学研究的三大派系,竟然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鼎足而分的三大学术文化派别与思潮的重现。这是十分有意思的。其实,这后三大派系正是前三大派别与思潮的继续,更确切地说,是前三大派别在当代新儒学研究领域中的表现。有意思的是,毫无凭藉、花果飘零的新儒家历尽劫难而依然挺拔峭立、影响日彰。所不同的乃是,当年对中国文化

化和儒学公然地欲一体倒尽的虚无主义、激进态度、暴戾气,虽曾由激进的“河殍”派一度风流而鼓噪泛起,大体而言,被公正的时光